

新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演变进程分析

陈红英 戴孝悌

摘要：新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可划分为封闭经济条件和开放经济条件下两个大的、七个小的农业产业发展阶段。中国农业产业发展的演变表明，要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必须彻底改革城乡分离、工农分离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战略，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不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农村金融制度和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强化农业支持保护制度，进一步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关键词：新中国；农业产业；演变；发展经验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335(2015)01-0064-04

农业产业发展是指农业产业总体产生、成长的一个不断从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进化过程，中国的农业产业发展具体是指由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过程^{[1] (P22)}。传统农业产业是指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主要依靠人力、畜力、手工工具等手工劳动方式，采用历史上沿袭下来的耕作方法和技术，发展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现代农业产业是广泛地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科学管理方法的社会化农业，它是由传统农业产业向前、向后不断演化，涵盖一、二、三产业的现代农业产业系统。可见，农业产业发展既包括农业劳动方式的发展转变，也涵盖农业产业结构的发展演变。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农业劳动方式的转变和农业产业结构的演变来分析总结中国农业产业发展的经验教训，以便加快推进中国农业由传统农业产业向现

代农业产业的转变。

一、封闭经济条件下农业产业发展分析

(一) 1949-1957年中国农业产业快速恢复和发展

1949-1957年，中国农业产业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为迅速医治多年战争对农业的创伤，恢复农业产业发展，国家首先在1950年6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指导推动全国土地改革，到1953年春，除新疆、西藏、台湾等地方外，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使得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实现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生产力，大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其次，与土地改革同步，国家开始将农业个体所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以进一步解放农业生产生产力。最后，提出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

陈红英，女，博士，南京晓庄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三农”问题；戴孝悌，男，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管理。

基金项目：南京晓庄学院科研项目“产业链视域中的中国农业产业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12NXY22）和“基于一号文件视角的中国农民民生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12NXY26）。

的方针。由于1953年开始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为配合这个战略的实施,国家开始实施“统购统销”,从农业中提取剩余,以确保优先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和资源。因此,为解决这个资源问题,国家提出发展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特别是1956年国家以解决农业制约工业化问题推出的对今后若干年农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1956年到1967年我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国家通过组建农业科技工作体系,以促进和推动农业产业快速发展。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资料显示,到1957年,农业化肥施用量增长了好几倍达到37.3万吨,农业机械总动力也增长到12.1亿瓦,农业产业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全国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11318万吨剧增为1957年的19505万吨,种植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在不断下降,林业、牧业和渔业的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在不断增加。

(二)1958-1965年中国农业产业不断调整

1958-1965年,是中国农业产业“大跃进”和农业产业调整时期。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引发了农业“大跃进”运动,农业中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与农业“大跃进”运动相配合,1958年8月,农村又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化后,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农业丰产不丰收。因此,从1959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后,中央开始整顿人民公社,并着手对农业、农村经济体制进行局部调整。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严峻的形势迫使党中央不得不采取“三包一奖”等制度措施促进农业产业发展。系列措施加上开始“农业学大寨”运动,对中国农业产业发展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农业产业政策经过不断的调整,使得农业化肥施用量由1957年的37.3万吨增加到1965年的194.2万吨,农业机械总动力由1957年的12.1亿瓦增加到1965年的109.9亿瓦(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资料),因此,全国的粮食产量也有了一个较大幅度的提升,仅一年时间,粮食产量就由1964年的750亿斤剧增为1965年的3890亿斤,棉花产量则由1964年的3325万担增加为1967年的4707万担^[21(P88)]。这期间,种植业、林业、渔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有些许下降,而

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则有一定程度的增加。

(三)1966-1977年中国农业产业调整恢复

1966-1977年,农业产业在纠“左”和调整中得到恢复和发展。196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由此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全国范围内的农业、农村、农民大内乱。文革中,由于一切工作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农业生产始终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虽然中共九大后,主持政府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同志着手治理受到严重冲击的经济秩序,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支持农业产业发展,农业在纠正“左”倾错误和调整中得到了一些发展,但总的来说,由于文革“左”倾路线的严重干扰,使调整时期刚刚兴起的农业生产又出现停滞、下降的局面。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此后的两年时间里,由于“左”倾思想远没有被肃清,尽管中共中央、国务院采取了系列加强农业产业发展的措施,但效果仍不理想。直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才从根本上端正了农业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为后来农业产业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期间农业产业政策在纠“左”中不断进行调整,使得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农业化肥施用量由1965年的194.2万吨剧增到1978年的884.0万吨,农业机械总动力也由1965年的109.9亿瓦剧增到1978年的1175.0亿瓦。因此,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全国的粮食产量由1965年的19453万吨增加为1978年的30477万吨(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资料)。这期间,种植业、渔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有一些下降,而林业、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则有较大程度的增加。

二、开放经济条件下农业产业发展分析

(一)1978-1991年中国农业产业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农业产业第一次大的变化是在1978-1991年。首先,由于改革是先从农村开始,并且这次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制度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因而为农业产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其次,1981年,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报告》的通知,提出

要改变过去“以粮为纲”的生产方针,实施“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战略方针,为农业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最后,1982-1986年,中央连续下发了5个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推广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发展多种经营,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搞活商品流通和市场经济,逐步地破除束缚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较快地促进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3](P7-13)。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资料显示,这期间农业化肥施用量由1978年的884.0万吨剧增到1991年的2805.1万吨,农业机械总动力也由1978年的1175.0亿瓦剧增到1991年的2938.9亿瓦,全国的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30477万吨增加到1991年的43529万吨。此时,糖料、油料和烤烟等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也有了显著的增加。可见,这个阶段随着中国农业科技进步水平、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和农业综合产出能力的显著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逐年稳步提高。又据1992年中国统计年鉴资料,与1978年相比,1991年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所占比重由76.71%下降到63.1%,此时牧业产值所占比重由14.98%上升到26.5%,渔业产值由1.58%上升到5.9%。可见,这期间过去高度单一和效率低下的产业结构模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农业内部农林牧渔业之间的关系也逐步趋向合理。

(二)1992-1998年中国农业产业稳步发展

改革开放后农业产业第二次大的变化出现在1992-1998年。首先,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人民思想进一步得到解放。随即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决定》,提出要以市场为导向继续调整和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进一步把农产品推向市场;要以流通为重点建立贸工农一体化的农业经营体制;继续增加农业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依靠科技进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进一步建立健全农业标准体系和监测体系等。其次,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三十年不变的稳定土地承包政策,以鼓励农民增加投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最后,90年代中期,国家打出

大幅度提高粮食、棉花收购价格,以及政府实施“米袋子”省长负责制等组合拳,极大地促进了农业产业的发展,使得粮食等农产品产量连年增加,至1998年,粮食产量达到破历史记录的51230万吨,棉花达到450.1万吨,推进了中国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向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转变,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后来农业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资料计算,与1992年相比,1998年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所占比重由61.5%下降到58.0%,此时牧业产值所占比重由27.1%上升到28.6%,渔业由6.8%上升到9.9%,农业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三)1999-2003年中国农业产业结构战略调整

改革开放后农业产业第三次大的变化发生在1999-2003年这个时期。一方面,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种植业生产连年丰收,粮食、棉花、食糖等农产品国家储备和商业库存大幅度增加,畜牧业、水产品产量持续增长。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资料,至1999年,粮食产量达到50839万吨,棉花产量达到441.7万吨,糖料产量达到7635.3万吨,肉类总产量达到5949.0万吨,奶类产量达到806.9万吨,水产品总产量达到3570.1万吨,此时国内大部分农产品出现了阶段性、结构性的供大于求。另一方面,据上面的计算,1998年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所占比重为58.0%,牧业产值所占比重为28.6%,渔业所占比例为9.9%,可见,农林牧渔业之间的比例仍不完善。为此,1998年,中央提出新阶段中国农业发展的中心任务是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经过这段时期的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国农林牧渔业之间的比例进一步趋向合理。据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资料计算,与1999年相比,2003年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所占比重由57.5%下降到50.1%,此时牧业产值所占比重由28.5%上升到32.1%,渔业由10.3%上升到10.6%。

(四)2004年以来中国农业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

自2004年起,中央又就农业、农村等问题连续下发了11个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大农业技术、

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加快农业科技创新;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创新,促进农业生产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推进工业反哺农业战略,全面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强化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以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围绕农业现代化,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继续完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41](P61-62)}。于是,中国农业产业发展进入了依靠加大农业投入、大力开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用先进科学技术装备农业、着力推动资源要素配置向农业倾斜以提高农业质量、优化农业结构和增加农业效益为主的新阶段,农业产业结构也从以往只注重数量比例关系间的调整,转向强调农业产业结构质的飞跃。据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资料计算,至2012年底,粮食产量达到58958万吨,并且这是自2007年以来粮食产量连续突破50000万吨大关,棉花也达到6835975吨。就农业产业结构而言,2012年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所占比重由2004年的50.1%上升到52.3%,林业产业所占比重由2004年的3.7%上升到3.9%,此时牧业产值所占比重由33.6%下降到30.4%,渔业由9.9%下降到9.7%。

三、总结

改革开放前,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中国长期实行人民公社的农业经营体制,农产品统购统销,导致工农产品价格出现“剪刀差”,所有这些严重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忽视工业对农业的技术支持,农业生产技术长期没有大的突破,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产业也一直局限于单一的生产环节,延续了新中国成立前种植业占绝对主体地位、农业单一的粮食生产功能的格局,显著表现为“农业=种植业=粮食”的农业产业运作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农业产业政策的适时调整,农业产值稳定增加,农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首先,种植业比重不断缩小,畜牧业、渔业比重持续上升,农业生产结构不断优化;其次,粮食作物的比例不断优化,

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农产品品种结构不断优化,农业产品结构显著改善;最后,主要农产品良种覆盖率和优质化水平明显提高,农产品总量持续增加,农产品质量也不断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显著增强,农村第二、三产业得到长足发展,中国农业进入了一个全方位的结构调整优化和功能调适的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由传统农业迈向现代农业的进程加快。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业产业发展的历程表明,中国农业产业在由传统农业产业迈向现代农业产业的征程中,有经验也有教训。要加快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首先,要全面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彻底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强制筑造的城乡分离、工农分离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使农业生产要素资源在城乡间和工农间自由流动,消除阻碍农业产业发展的根本障碍;其次,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继续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为保持农业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再次,继续实施工业反哺农业的战略,加大农业技术投入和农业水利等基础设施投入,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最后,不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围绕农业现代化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强化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继续完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优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参考文献]

- [1] 郭剑雄. 农业发展:三部门分析框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 [2] 张新华. 新中国探索“三农”问题的历史经验[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 [3] 郑有贵, 李成贵. 一号文件与中国农村改革[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8.
- [4] 肖功为.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政策创新的历史逻辑——基于16个中央“一号文件”政策的考察[J]. 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2).

责任编辑:李丽娜